

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汇编
顾问 罗卫东 杜维明

马一浮

国学会讲

吴光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马一浮

国学会讲

吴光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一浮国学会讲 / 吴光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308-18867-8

I. ①马… II. ①吴… III. ①马一浮(1883—1967)
—新儒学—思想评论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5272 号

马一浮国学会讲

吴 光 主 编

特邀编辑 姚 瑶

责任编辑 胡 畔(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虞雪芬 赵 珏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867-8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前 言

2012年5月,浙江大学在当代著名儒学家杜维明先生的建议下,宣布成立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聘请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与杜维明教授任中心主任。2013年3月,又在两位主任的推荐下,由浙江大学聘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光教授任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兼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聘任本校历史系副教授徐立望为中心副主任。中心在2013年4月23日举行的马一浮诞辰纪念大会上正式揭牌。

中心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马一浮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会议由浙江大学发起并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合作主办,于2013年4月23—24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著名学者杜维明、戴璫璋、陈来、刘梦溪、龚鹏程等8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由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举行了由杜维明、刘梦溪、龚鹏程、吴光主讲的以“马一浮与国学”为主题的会讲。在4月23日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又由戴璫璋、陈来先生做了主旨演讲。现将这6篇演讲稿收入本书,作为《马一浮国学会讲》的前6讲。

这次大会之后,在由我主持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工作的前后5年时间里,我们组织了“马一浮国学讲座”,邀请陈来、舒大刚、冯沪祥、郭齐勇、杨国荣、林安梧、董金裕、毛佩琦、李帆、郑宗义、陈卫平、黄朴民、林家骊等14位知名教授做了17场讲座。讲座的名称虽然称之为“马一浮国学讲座”,但主讲者的讲题并不限于马一浮国学思想的研究,而是就其所长展开演讲,打开了听众的视野。前来听讲的既有浙大的本科生、硕博生,也有本校的老师 and 慕名而

来的社会各界人士。学者们的演讲深受听众欢迎。浙江大学图书馆和学生社团青素国学社都积极参与,协助我们出海报、发通知,为办好国学讲座做出了贡献。因为这些讲座既有专业知识的传播,又有独立思想的深度,编者特选择 17 场讲座中的 14 讲与纪念大会的 6 讲合为一册,定名为《马一浮国学会讲》正式出版,以飨读者。

需要说明的是,参与会讲主持工作的,除了作为中心执行主任的我,还有中心副主任徐立望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哲学系原主任董平教授。本书各讲的编辑整理,主要由中心秘书姚瑶同志承担,由我审校。现在,我和姚瑶同志都已辞去了中心工作。这本书就作为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前五年(2013—2017)工作的一个见证吧。

吴光敬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杜维明(1)
马一浮与国学	刘梦溪(4)
马一浮新经学的基本特色	吴 光(13)
马一浮易学管窥	龚鹏程(16)
兴于《诗》终于《易》的成德之教	戴璵璋(31)
马一浮的心学思想	陈 来(46)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陈 来(59)
纵论国学的体系及其核心精神	舒大刚(77)
从国学智慧看治国之道	冯沪祥(94)
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	郭齐勇(110)
儒学:本然形态,历史分化与未来走向	
——以“仁”与“礼”为视域	杨国荣(127)
“新儒学”与“新儒学之后”	
——兼论“大陆新儒学”与“台湾新儒学”	林安梧(141)
从尧、舜其犹病诸到人皆可以为圣	董金裕(157)
从洪武到永乐——明朝的盛世之路	毛佩琦(170)
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侧面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李 帆(182)
论明清之际儒学的一元化倾向	郑宗义(194)
层面结构 礼仪建设 话语体系	
——儒学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启示	陈卫平(218)

怎样读《孙子兵法》	黄朴民(226)
关于《诗经》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林家驹(240)
《诗经》的“兴观群怨”及其艺术成就	林家驹(256)

马一浮学术的当代意义

杜维明^①

今天我作为言者,我不是直接谈马一浮先生的哲学,而是谈它现代的含义。具体地说,在诚信缺失、道德最低的底线已经不能维持的困难时期,马一浮的哲学所体现的儒家人文精神,它的含义在哪里?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身体、人的心机、灵觉和神明四个角度。今天从儒学的思路来看中国的发展,我们所借鉴的不是西方的模式,只是英美模式,只是经济主义,只是线性思维,这是不够的。马一浮的思想告诉我们,它不是线性思维,而是复杂体系,是全面性整合的思维,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各种不同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因为它体现的价值是开放、多元的。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除了东亚文明的变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和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及非洲进行全面深入的交流。可能最近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可是近年来中美的交流多半不是对话,属于贸易的对话、生态的对话、战略的对话、人民币升值的对话,都只是博弈、抗争或者施压。如何转变这种不健康,甚至极其危险的情况,是我们现在都必须关切的大问题。

从长远的视野来看,为了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我们要重视两个非常重要的对话空间:一个是传统和现代的对话;另一个是科学和人文、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对宗教了解非常片面,多半从早已过时的工具理性来了解,而对精神世界、超越的价值、向往天国彼岸内心的渴望和追求真善美不闻不问,马一浮先生体现的就是

^① 杜维明,1940年生,著名儒学家,当代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真善美的终极价值,平时我们对这些多半是掉以轻心的。马一浮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种极高的知性、自信,达到了悟性,不仅和科学交融,而且体现了真正深刻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仅是当下,我们要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要考虑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同时也要考虑5000年来中国文化大的发展趋势,这是我们的历史意识,我们还需有强烈的未来意识。我们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个人,也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而是为了千秋万世,我们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必须考虑长远的问题,要为千秋万世考虑。马一浮提到为天地立心,人在宇宙大化之中如何找到他安身立命的点?每一个知识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所有人,为了千秋万世。

儒家核心价值不是从宏观的世界出发,仁义的仁要看你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关怀,有没有爱,礼就是文明礼貌。我们是用法治的方式来维持社会最低的秩序,必须有法,如果以人治来取代法治那是一定失败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如果没有文化的自觉,没有智慧,那也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把信息和技术 and 知识混为一谈,如果把知识和智慧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有很多知识、信息、数据,但是我们所做的各种决定、各种策略没有智慧,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很强,但是它的文化力量很弱,如果文化力量不能被调动起来那是不行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从人文的精神来看,应该把印度当作非常重要的参照,印度每五年就会有一大批的哲学家产生。

21世纪的领袖应该具有几个基本的条件,首先领袖能够筹集社会资本,不仅仅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以数据来显示,但是社会资本不可能以数据来显示,通过沟通理性,包括友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信任,包括诚信,等等来显示。假如没有社会资本,社会的基本安定就很难维持。除了社会资本以外,一个领袖应该要培养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就是马一浮所讲的经学能力。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只做经济人,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追求意义的人,能够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人。我们需要有一批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伦理的智慧或者情商,除了物质条件以外,有精神价值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越能够掌握资源的人,对社会越有责任感;越有能力,越能够对大家的事情表示关怀。我们要发挥儒家的这种精神,必须从教育下手。

我们要培养一种敬畏感,可怕的是目前我们的男女老少没有真正的敬畏感,这是根深蒂固的大问题,传统的人,大家对天、对地、对国家、对社群、对老

师、对父母有敬畏感。我们应该注重对我们自己的职业,对我们的学术,对我们的研究,对我们的个人有敬畏感。大家要能够形成一种共识,对大家的将来有一种承诺,有这种承诺也可以引发敬畏,有了敬畏感我们开始有了诚信,有了最基本的诚信,其他的才能逐渐培养。

我们希望通过马一浮这样一个伟人的认识,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种新的认识,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从最基本的敬畏心开始,逐渐使我们的民族成为有成就的民族,能够在文化上有发展的民族,将来我们和印度的学者,和拉美的学者大家对谈的时候,不能只是以我们的 GDP 来体现现在的民族自豪感。

马一浮与国学

刘梦溪^①

浙江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我是第一次来你们学校，但四校合并之前的杭州大学是我非常熟悉的学校。杭大的一些教授，像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戏曲专家徐朔方先生，还有词学家夏承焘先生，都是我认识并且熟悉的长辈。我几次到过杭州大学，它的人文传统在全国的高等学校里面是一流的。

我也熟悉你们原来的校长竺可桢教授，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的书我细读过，特别是他的日记，我读得非常仔细。他怎样去请马一浮先生，见面情形，前后的经过，以及马先生在抗战时期，你们的学校已经从杭州搬到江西泰和的时候，第一次讲国学，竺先生也在下边。他日记里都有记载。后来到广西宜山，竺先生也在那里。我看他的日记很感动，在战乱流离中的这样一所学校，可以说始终弦歌未绝。他的妻子在流离中去世了，而许多的学生和教授都蒙受苦难。但这所大学始终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无论是在泰和还是在宜山，都是如此。我看这段历史，个人非常感动。那么，可以想见，现在的浙江大学如果能够承继这个传统，未来自是不可限量。

一、王国维是否真的“烧书”

我是念文学出身，但是中间在学问上有一个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不那么喜欢文学，因为在集中读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的书，看他们的

^① 刘梦溪，1941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章写得太好了，学问太精到了，自己就不想写作了。甚至以前出的一些书，关于文学的，越看越不顺眼，在家里都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由于自己有这个感受，我就相信王国维烧过书。大家知道有一个掌故，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罗振玉有点不赞同当时的新的政治变局，他就躲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那时候王国维也跟他一起去了，他们是好朋友，两个人的关系，故事非常生动，我不去讲它。罗振玉说，王国维到了日本以后，在他的影响下，把带去的《静安文集》烧掉了。王先生早期学日文，后来又学英文，喜欢康德、叔本华，把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在那个前后，他办《教育世界》杂志，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这些文章，关于教育的，关于文学的，关于西方哲学的，关于美学的……这些文章后来收辑起来，出版为书，叫《静安文集》，他到京都的时候，带了100多册。罗振玉讲，王国维到京都以后，学问发生转变，把带去的书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大都认为他不会烧书，我也算研究王国维的人之一，但我相信他会烧书。

因为，一旦进入古史研究，接触到金文、甲骨文研究，就会觉得文学研究未免浮泛。我当时也产生了这个思想，非常看轻文学。但我现在必须补充，当我年长以后，又觉得文学有点意思，它还是史学和哲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我是说，文学也不可偏废。当你的年龄有一点大了以后，学问积累到一定时候，你会觉得文学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你想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必然要走向史学和哲学，而在这个走向的阶段当中难免轻视文学。可是当年龄再大以后，觉得文学也是多么好啊！

二、无论何种学问太“热”都未必好

20世纪的学者当中——我喜欢王国维，喜欢陈寅恪，可以说研究了他们多年——但是我还喜欢另外一个人物，马一浮。我在1996年为一套书写的长序，叫《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讲到陈寅恪和马一浮的时候，我说陈寅恪是站在地上，怀着家国的深情，和历史的兴亡之感；而马一浮，我说他站在云端，很早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在20世纪的学者当中，能够完成自我超越的学者并不多，马先生是一个。

当然，当时很多学界的朋友不赞成我的说法，庞朴先生说：“你把马一浮说成神仙了，怎么可以？”李泽厚也不赞成。我多么高兴，刚才杜维明先生居然说

马一浮提出的“国学就是六艺之学”的观点，他表示赞成。杜先生，你知道，我这个观点孤立了10年。（听众笑，杜维明插话：汤一介也赞成）是的，汤一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年长，汤先生也同意“国学是六艺之学”。我的文章是2006年发表的，叫《论国学》。我为什么会特别地赞成，简直是不得了地赞成，深深地赞成，无比地赞成（听众笑）马先生的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立说？他的这个见解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大家知道近10年，中国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传统文化热，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百年以来，我们长期处于传统的断层当中，当经济有了一点根基之后，围绕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一个传统的重建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重建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不足为奇，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看法，只要是学问，一旦成为“热”，就没有好事情，还是“不热”好。因此我提出国学不需要那么“热”。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在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热”：一个是《红楼梦》“热”，叫“红学热”，还有一个是“鲁迅热”。鲁迅好不好？当然好。《红楼梦》好不好？当然好。“热”的结果，《红楼梦》蒙了很多污，到现在很多人一听“红学”还在摇头。很不幸，我曾经很长时间，从大学开始就研究《红楼梦》。“鲁迅热”以后，鲁迅也蒙受了扭曲，反而鲁迅在当代的价值没有真正得到认知。现在很多人否定鲁迅，其实鲁迅何等深刻啊！他没有过时！仅仅由于当年“热”的时候把他捧得太高。人们有一种逆反心理，就把他放在了地上。但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学术的人，甚至了解文学的人，岂可轻视鲁迅！当然也不能轻视《红楼梦》，我只是说，无论何种学问，只要是学问，太“热”了都未必好。

国学也一样，如果在没明白国学为何物的情况下，“国学”就大热起来，肯定不是好事情。当然大家真正了解国学了。也就无所谓“热”，就变成日用常行了。前些年甚至说出现了“陈寅恪热”“钱锺书热”，我个人也甚不以为然。因为陈先生的著作并不很好读，还没研究到怎样呢，就已经“热”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马一浮热”？我希望马一浮不要“热”。（听众笑）为什么？马一浮的书以及他的人格精神最不好懂。甚至最近，我还说过：“我还没看见有几个人真正读懂了马一浮先生的著作。”我的意思，读马，研究马，不那么简单，不那么容易。

三、马一浮是“儒之圣者”

马先生不仅仅是学者，不仅仅是大儒，他还是20世纪的“儒之圣者”。过

去——杜先生了解了——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了不起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我说马先生是20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你不能讲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重构当中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但马先生又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是“逸士”。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原来杭州大学的一些朋友，当时就流传，很多人不敢去看马一浮。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学问太大了，他的眼光太厉害了，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全知道。所以他是“高人”。

马先生学问根底之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当然这是佛家的话。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马先生身上一无“习气”，把这“习气”完全“刊落”了。他是位“圣者”，他有很多思想，我没法在今天一一细说。

四、国学概念的取义及流变

马一浮的国学定义为何重要？在于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也是近30年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由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

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要知道这两位都是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的地位,何等的人物——他们提出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力,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被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

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 1902 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做分疏。

时间一直到 1923 年，大家知道，1922 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 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 1923 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做了一次分疏。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50 年代不讲这些了——“国学”的概念继续讲，但不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就把握不住主要内容了。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即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

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五、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所以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你们浙江大学转移到江西的泰和，在那里，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关于马先生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这件事可以写一本书，竺先生一到杭州就任——他是大气物理学家，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刚到杭州，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学问超群，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写，这说来话长，以后再做补充。

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上面批准。（听众笑）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第二年，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富阳、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100箱书，他没有太太。马先生的婚姻的故事更好听，我没法给大家讲了（听众笑）。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听众笑）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我能记住信中的很多句子，不讲给大家了，讲的时间超过了（听众笑）——然后是，竺校长接到此信，如获至宝，于是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楷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